

## 西南联大的日本研究——以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认识与主张为中心

作者： 闻黎明 文章来源： 伊继东、周本贞主编《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 点击数： 更新时间： 2010-6-3

在中国近代史上，日本无疑是对中国侵略最重、压迫最深的国家，七七事变的爆发，更是将中华民族置于生死存亡的境地。当中国人民被迫投入自卫战争之际，如何对待和处理两国关系，便成为捍卫民族尊严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诞生于抗日烽火之中，集合了一批优秀知识精英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八年历史上进行过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国际关系分析与外交对策研究，其中日本问题占有相当比重。西南联大对抗战建国的这一贡献，迄今尚未得到重视，有待梳理总结。这里，仅就联大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若干思考做以初步介绍，以期展示联大人在重建中日关系及建立国际永久和平秩序上的一些思想轨迹。

### 高度重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西南联大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基本与国内同步进行。有鉴于此，有必要先就中国民间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作以简略回顾。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是随着形势发展和战局演变逐步开展的。七七事变爆发的初期，日本在军事攻势上咄咄逼人，尽管国际间多有道义同情，但绥靖政策仍居主流，故人们虽坚信抗战能够成功，而何时胜利，断言尚早。1939年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后，西方民主国家穷于应付，处置日本问题亦难提上日程，故一般来说，民间对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提出，开始于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且可大致划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对美军基地珍珠港的袭击，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帷幕。对于这次军事行动，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日本资源缺乏，军力不足，支撑亚洲战场已疲惫不堪，竟又开辟第二战场，这种不自量力无疑是火中取栗，加速灭亡。天津《大公报》曾用“暴日对英美的进攻，是侵略者的最后冒险，也是日本民族最后走上切腹之路”一语加以形容，形象地道出了中国人的共同看法。1942年1月1日，中国与美、英、苏等二十六国签订了标志着反法西斯侵略同盟形成的共同宣言，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士气，这一形势下，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应运而生。这一时期，太平洋战火刚刚燃起，战局形势千变万化，摆在人们面前首要的任务是遏止日本气焰，反击日军进攻。因而处置日本问题虽然提出，但尚属萌芽状态，而西南联大教授钱端升、王信中，则已经站在保障远东和平的立场上，考虑到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基本原则。第二个阶段，是《开罗宣言》公布之后。1943年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联合对日作战、解决远东问题的计划。会上，对于远东战后的安排，三方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在太平洋地区夺取或占领的所有岛屿，将中国东北地区、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归还中国等。会议签署的《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后经斯大林同意，于1943年12月1日对外公布。《开罗宣言》在苦撑待变的中国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人们为反法西斯同盟团结合作、打败日本的决心振奋鼓舞，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在此背景下又一次提出。《开罗宣言》在战后处理日本问题上主要涉及的是领土问题，关于处置日本，虽有条件投降及惩治战争祸首等原则，但尚未明确日本战后应该建立什么国体。开罗会议时，罗斯福曾私下问蒋介石的意见。蒋答复说：“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起来预闻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的国体如何，最好由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如果日本国民能起来对他战争祸首的军阀革命，推倒他现在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消除他侵略主义的根株，那我们就应该尊重日本国民自由的意志，去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的形式。”〔①〕另外，蒋介石1943年11月23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交谈时，亦提到战后日本可用部分实物作为赔偿的初步设想。尽管这次谈话当时并未公布，但中国舆论已开始接触到根除侵略。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这一阶段刊登了大量讨论日本问题的评论，其中有些就涉及到建立国际新秩序及经济赔偿等某些具体环节。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44年底，持续到战争胜利之后。这一时期，英美苏同盟国在太平洋和欧洲两个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并在1945年2月初的克里米亚会议上讨论了战后对德国的处置。三国声明由于苏联的关系，没有提及日本，但此前中国民间在太平洋学会第九次会议的献计献策中，已经再次出现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热潮。太平洋学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宗教界人士发起的一个旨在交换研究太平洋地区和平秩序意见的民间学术团体，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九次会议定于1945年1月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温泉召开，而拟具的六项议题中，与日本直接相关者即有三项，且率先讨论战后日本地位问题。由于中国代表在1942年12月在加拿大蒙特莱勃兰城召开的第八次会议上没能提出多少切合实际的措施，曾受到国内舆论的批评，故以西南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教授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早早就着手为迎接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来的第九次会议进行准备。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围绕这一中心展开讨论。第九次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团是在蒋梦麟率领下参加的，与蒋梦麟同行出发的是代表团成员、联大教授钱端升，加上时在美国，并代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致词的胡适，西南联大共有三人参加了这次万众关注的会议。〔②〕会议期间，各国代表在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及彻底解除武装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但对是否改造日本政治和经济制度问题上则存在若干分歧。这些信息引起国内各界的极大关注，进一步推动了相关问题的讨论。一时，各种意见频频见于报刊，出现了从专家学者到平民百姓人人关心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现象。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自始至终对日本投入极大关注。联大教授主办的创刊于1939年1月1日《今日评论》，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八个月的1941年4月13日停刊，但在其两年多的时间里，刊登的文章仅标题中直接与日本相关者，就达46篇，其中有傅斯年的《英美对日采取经济报复之希望》，王信中的《日本外交政策的检讨》、《日本参加欧战问题》、《日本内阁的更迭与今后的政局》，陈序经的《暹罗与日本》、《越南与日本》，钱端升的《中日战争与美国今后的行动》、《侵略集团与防侵略集团》，伍启元的《中日货币战》，邵循恪的《德意日协定与我们对策》，罗隆基的《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王赣愚的《美国外交的新动态——援英与制日》、崔书琴的《论美国对日报复问题》，王化成的《国际联盟与援华制日》等。联大教授主办的另一个时政评论杂志《当代评论》，创刊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7月7日，其至1944年3月1日期间，刊登日本评论25篇，其中有蔡维藩的《日本的几个错误》，张桐生的《日本的空军》，王信中的《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等。而发刊于1944年12月1日的《民主周刊》，创刊八个月便抗战胜利，其后国内问题成为评论中心，但它至1946年8月2日创刊时，亦发表同类文章15篇，如曾昭抡的《攻日进入新阶段》、《克里米亚会议以后的世界》，费孝通的《祸根未除》等。至于联大教授在其他报刊上刊登的讨论日本问题的文章，如钱端升在《新民族》上发表的《论外交根本政策》，费孝通在《扫荡报》发表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和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的《自由应无垠》，及《中央日报》昆明版上刊登的《出席太平洋学会归来钱端升谈参加经过》等，亦不在少数。可见，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始终活跃在日本问题评论第一线，在讨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三个阶段里，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他们以自己的知识与学者的冷静提出的真知灼见，即使今天也具有学理的和现实的价值。

### 对战后处置日本原则的基本认识

1944年6月6日，英美军队在敦刻尔克等地成功登陆。同盟国在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预示着德国崩溃的日子不再遥远，战后如何处置轴心国，自然成为民间谈论的中心之一。一个星期后，云南《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专题社论，文中对各种主张做了一番梳理，归纳出“从宽善待”、“从严惩治”、“区别对待，着眼长远”三种意见。〔③〕那么，究竟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处置日本的原则呢？其实，这个问题早在中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被联大教授钱端升注意到了。1938年10月，战争刚刚进行一年多，钱端升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日本是一个“地势及土地都有资格成为比较繁荣、比较稳定的国家”，只是“因缺乏远大的外交政策，以致盛衰无常”。钱端升举例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就缺乏持久的外交政策，“今日联甲，明日联乙，今日南进，明日北进，今日拥国联，明日反国联，其唯一不变的就是向亚洲大陆侵略”。怎么对待这样一个国家呢，钱端升从维护国际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必须进行三项工作，第一是“摧破日本的武力”，第二要“待日本人民以宽大”，第三为“助长国联的权威，使国联成为强有力的制裁机关”。钱端升认为这三者互为联系，缺一不可，否则日本就总是一个“长为强而横，或虽弱而蓄心报复”的国家。〔④〕钱端升的这篇文章，中心是借鉴世界大国经验，建议中国应当制定积极的长久的外交政策，并非专门论

述日本，但文中提出的三项工作，则已涉及到如何对待战后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问题。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当风云变幻的战局吸引着众人目光之时，始终关注日本动向的王信中，就思考了战后制裁日本的原则问题。王信中首先考虑的是必须解除其武装。他指出：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扰乱远东和平与破坏世界安宁的导因，认为欧美各国过去以为日本只能侵侮中国，外交大计仍以英美政策为转移，不敢与之抗衡，以致英国曾企图利用日本牵制苏联，维持远东均势。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们也认识到日本不但决心吞并中国，且有驱逐欧美而独裁东亚的梦想。接着，王信中分析了日本的民族性，认为日本民族刻苦耐劳，坚毅刚强，善于模仿而富有进取精神，因此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一跃而为世界列强之一。但是，“其性情偏激，气度狭隘，急功好利而负恩忘义的习性，不得不令人寒心”。明治维新前，一切文物政制完全取法中国，维新后便负恩忘义侵略中国，且得陇望蜀，野心永无止境。再次，王信中分析了关于日本与英美的关系，认为明治维新之初，美国对日本具有好感，不但首先承允废除对日不平等条约，且积极赞助其建设。英国更是这样，因欲利用日本牵制俄国，便不惜降尊屈节，与日本订立同盟。而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机会，战胜俄国，参加欧战，一跃而为五强之一。从这一点看，英国甚至可以说是扶植日本强盛的恩人。可是，日本一旦羽翼渐丰，便反口而噬。七七事变后，英美对日一再容忍退让，但日寇却咄咄逼人，最终不顾信义，利用谈判为烟幕，对英美施行闪击。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地位，北自日本本岛，南至南洋群岛、印缅边境，完全在其控制之下，就连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也一再对国人强调日本势力强大，决非可以轻易击溃，必须不断反攻。在上述论述之后，王信中对英美提出五项希望，前三项针对战争而言，后两项针对战后。其第四项为：“在击溃日本之后，为防范其卷土重来起见，必须消灭其武力，为着保障太平洋上的安全，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为着去除大陆上的威胁，必须由中国来限制其陆空军的数量，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第五项为：“战后我们虽不应剥夺日本民族自下而上的权利，但为确保其和平生活起见，我们对于其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理应以合理化的指导。”王信中的建议，核心在于彻底解除日本武力，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以保障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因此，他强调这些都是“防范日本黷武主义的复活，及保障远东和平的最低条件”，如果“战后不予合理的制裁以防患于未来”，则敢断言，“以日本民族性的勇狠好斗及偏激狭隘，二三十年后必将卷土重来”。[⑤]对于解除日本武装的步骤，王信中提出战后“必须消灭其海空军及制造舰艇飞机的设备”，“接收其制造军火的设备”。此外，他还提出了对日本“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予以合理化的指导”，主张改革日本政体，改变日本经济为军事服务的关系等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⑥]钱端升是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资深法律学家，王信中则是在早稻田获得硕士学位的国际关系学家，他们以学者的眼光审视现实政治，因此一切便能从防范日本黷武主义复发的角度，提出和认识战后处置日本的基本原则。解除日本武装只是建立国际和平秩序的一个方面，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也包括更多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日本。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不断侵略，滋长了中国人普遍对这个近邻的刻骨仇恨，泄恨情绪的存在并不值得惊讶。不过，西南联大的远见之士却能从持久和平的立场进行思考。由西南联大教授主办的《当代评论》，是学术界里颇有影响的政论杂志，它曾批评当时在对待日本问题上存在的两种错误。该刊在一篇题为《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的社评中说，“一个从事战争的国家对敌国的态度，通常容易犯两种错误”，一种错误是“感情用事地主张尽量惩罚和压制敌国，使敌国永无翻身的一日”，另一种错误是“空想主义的毛病”，“希图将来能够树立一种和平的世界，使本国与目前的敌国都能和平相处”。社评认为，第一种错误的结果，只能是“在情感主义支配之下”，使两个国家“结下百年不解的仇恨，使战后的世界无法走上永久和平的康庄大道”。第二种错误，则“忽略了现实的环境，或者只重空想而不切实际，或者只谈崇高的理想而缺乏可以实施的具体方案，结果不但不能使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得到实现，而且反因他们的意见而增加局面的纠纷”。在以什么态度对待战败的日本问题上，评论在肯定了“我们对于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消灭中国，致使中国人民遭受有史以来的最大痛苦，当然是十分痛恨的”之后，紧接着提醒“我们不应因此就主张消灭日本，或使今后若干世代中的中国人民分担目前日本军阀的过失”，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必须避免情感主义和空想主义，而应以理智和现实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理解‘国与国间，无百年不解之仇’”。社评赞成《开罗宣言》的第六原则，即“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认为这个原则“也应同样地应用于日本”，因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所谓兄弟之邦，在理论上两国是没有不能和平相处的道理。”[⑦]《当代评论》的上述意见，可以用“宽大”两个字概括，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时为云南大学教授的刘文典非常赞成这一立场。刘文典很少写时政评论，但他这时却写了一篇长文《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的长文。文中说：“关于国家民族的事，是要从大处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何况“从东亚的永远大局上着想，从中国固有美德‘仁义’上着想”，中国也不应该有狭隘的报复思想。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刘文典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法关系为例，说法国之所以能奋斗到底，全凭法国总理克莱孟梭的勇气毅力和火一般的爱国心，可是，克莱孟梭的“爱国心过于热烈”，就“流于狭隘，失之偏激”了。当年在凡尔赛会议上，美国总统威尔逊很有远见卓识地提出过许多方案，以杜绝今后的祸根，建立永久和平的基础。可是克莱孟梭“被他那狭隘的爱国心所驱使，对于战败的德国专施报仇雪恨的手段，一味的要逞战胜者的威风”，以致“忘记了胜败强弱都只是暂时的事，历史是转变不已的，报应是循环的”。结果，由于维廉一世有意选择围攻巴黎的日子，在凡尔赛宫举行德意志帝国皇帝继位大典，法国也非要在这座离宫里签订和约不可。后来，“法国战败求和，希特勒也就偏要在当年德国俯首求和的地点，偏要在当年福煦元帅威迫法国代表的那一辆火车上，威逼法国的代表”。刘文典不厌其烦地叙述这段历史，目的是为了说明在处置日本时不应有报复心理，因为正是“克莱孟梭一味的要报普法战争的仇恨，全不顾虑到德国人后来的报复”，最后方“把一个德意志国家，日尔曼民族，逼迫到无路求生的地步”。[⑧]根据上述历史教训，刘文典明确提出“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的意见。他主张“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其理由是：日本“自立为一个国家已经一二千年，我们既不能把他根本夷灭，改为中国的一个省分，依然让他做他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也就应该有个待国家之道”。末了，刘文典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和这两个大国家民族的关系，是东洋和平的基础，今日应付处理稍有失当，就会种下将来无穷的祸根”，德国与法国的循环报复，是为时不远的殷鉴，希望政治家和各界人士，“把眼光放大放宽，平心静气的筹划一番，作一个可以垂之久远的打算。”[⑨]联大人的上述认识，表明他们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面对的不只是摆在面前的战争善后问题，也不只是考虑到重建两国的关系，他们想的是更为长远的国际永久和平，这正是包括联大人在内的许多有识之士主张对日本采取宽大政策的思想基础。伍启元教授在《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中曾用一段简练文字对此做了概括，他说：“这次战争的目，在消灭阻碍人类文化进展的法西斯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树立一种永久的和平，而在对轴心国复仇”。[⑩]显然，联大知识精英在制定战后处置日本原则这一问题上，已超越了国仇家恨的民族意识，表现了服从世界和平利益的理性态度。

### 战后处置日本的若干具体意见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已有诸多著述，故这里不再赘述惩治战犯、解除日本武装、收回失土等为人熟知的问题，仅介绍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民间经济赔偿、日本政体改造、天皇制度应否保留等三个问题。（一）赔偿问题

前文说到，在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上的主流舆论是主张宽大对待，但宽大是有尺度的。伍启元教授是对日宽大的支持者，同时也是经济赔偿的坚持者，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没有强迫的捐献，没有惩罚的赔款”的观点，极表赞成，认为对这种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赔偿要求观念的修正和限制，主要表现在战胜国不应要求军事赔偿，只应要求补偿平民损失方面。基于这一立场，他提出：“轴心国战区中所有的非法残暴的行为，在占领区中所有的剥削的抢夺，及在一切区域中不合理地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的同盟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至少在原则上，同盟国是应该要求赔偿的”。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在东北、华北、东南、闽粤、华中等地“所加诸中国平民的损失，所作的各种剥削，所抢夺的物资，及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诸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杀害与破坏”，是“不可宽恕的”，“至少在原则上应使日本全部负担这些过失的赔偿”。[11]《当代评论》与伍启元的观点一致，它认为免去日本对中国战费的赔偿，只是为了表示宽大，如果不向日本提出归还“他们在中国所劫夺的资产，或不负担他们能力所及的对是国平民的损害赔偿”，那岂不“变成侵略及罪行的鼓励者了”。因此，它主张“至少应该在原则上强使日本这一代的人归还日本所劫夺的财产，并负担他们侵略所引起的损害赔偿”。[12]按照放弃军事赔偿，只进行民间损失索赔的想法，伍启元开列过一个包括十四个项目的赔偿范围：“（一）日本（指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本人民、日本所支持的伪组织及汉奸）在战区及占领区（包括东北）中对中国人民所抢夺、征取，以及少数代价强购的粮食、牲口、原料、矿产品、制品、房屋，和其他物品，应全部作合理的赔偿。（二）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工厂矿场所加的破坏，及对战区或区中对工厂矿场所作的抢夺或迁移，应全部加以赔偿。（三）日本在战区或区中对对中国交通的破坏及对中国交通工具的抢夺、征取，与移动，应全部加以赔偿。（四）日本在中国沿海沿江所给予是中国船艘及渔业以各种损失，应由日本负责赔偿。（五）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中对对中国农民强制改变生产及因其他压迫而引起的损失，应加以合理的补

（六）日本对中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自陆空水三方面军事侵略所加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补偿。（七）日本在中国有计划地施行毒化政策，强制人民种植毒物及吸食毒物。此种政策违反人类道德及国际协定。将来中国因消毒（消除日本毒化政策）所须之各种费用（如戒烟院之设备等），应全部由日本赔偿。（八）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所抢夺中国的古物及有历史价值的物品应全部加以交还；日本对其他中国公物的夺取，亦应全部交还。（九）日本在中国境内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所作的破坏，及在战区与占领区对中国大学及文化机关的一切损害，应全部赔偿。（十）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所掠夺的白银准备、外汇准备，及其他资产，应全部交还。（十一）日本所发的一切伪钞，应于中国政府收回后，由日本依法给以黄金兑现。（十二）敌伪在占领区中所征收及接收的一切罚款、租税，及其他收入，全数应交还中国。（十三）日本在战区及占领区对中国人民的虐待，对中国人民强迫劳役，对中国人民征兵，和对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应对全部损害加以赔偿。日本对俘虏的非法待遇，亦应列入这一项范围之内。（十四）日本在亚洲各地对华侨生命财产的损害，应全部加以赔偿。”[13]

根据以上项目上，伍启元统计的损失为：工矿8亿美元，交通6亿美元，沦陷区人民和亚洲各地华侨财产5亿美元，金融8亿美元。上述相加，为27亿美元，以1937年美元比价折算，最低也达20亿美元。进行这一统计后，伍启元强调这个数目“过于保守”，“而绝不会估计过多”，他认为较合理的估计是40亿或60亿美元，但这并未包括日本在历次战争中抢夺中国的文物、书籍、及设备公物等，也未包括对占领区中国人民的屠杀奸淫虐待、强迫劳役与服兵役、对中国俘虏非法待遇，和所施行的毒化政策。[14]由于这些事件损害的数目，带有战胜国的主观判断，难有客观标准，因此他不愿加以推测。与伍启元和《当代评论》的主张不同，刘文典根据日本的承受能力，认为经济赔偿也应放弃。他说：无论哪种经济赔偿，最终“实际缴付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战争的责任者”，“何况近代战争都是倾注全部的金钱物力，打得民穷财尽，才分胜负。再要战败国的无辜穷民支付那天文学上数字的赔款，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15]刘文典是个个性很强的学者，常常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这个特点，也在索赔问题上有所表现，这就是他虽然不主张要求日本经济赔偿，却强调文化赔偿。刘文典说：提到“文化”两字，真令人按捺不住感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这次世界大战，“无论打得怎样猛烈，双方总还多少顾惜一点文化。英美的空军固不肯柏林大学，就以德国那样的野蛮，也还没有肯炸牛津、剑桥和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因为双方都以文明自居，一面也以文明国待敌人”。可是，唯有日本“把中国视为一群野蛮人种，自从开战以来，日本空军一味愿要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故意的、有计划的专拣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做炸弹的目标，这真是世界历次战争上所没有的野蛮残忍手段，人类历史上的耻辱。”[16]刘文典进一步阐述到：“中国这回所受的物质上的损失固然极大，但是那些都还是有形质可计算的，也就是有方法可补偿的”，而“文化上的损失，这是无数字可计算的，无方法可补偿的”。他发问到：“假使大英博物院、巴黎图书馆被毁，柏林大学、牛津剑桥被炸，试问赔多少万亿英镑可以抵补呢”。他历数了日本对中国大学、图书馆、博物院的有计划毁灭，痛心地说“秘笈珍本，天球河图般的实物都是我们先民遗留下来的祖产，世界文明上的遗迹，绝不是任何数量的金钱物资所能赔偿万一的”，“日本既对世界文明犯了大罪，就应当教他们把他们所保存的‘文物’拿来赔偿我们”。[17]关于文化赔偿的办法，对日本十分熟悉的刘文典可谓如数家珍。他说：“近几十年来日本财阀倚仗着金钱，乘中国民穷财尽，用巧取的方法，贱价收买去的文物，如岩崎氏的丽宋楼藏书，住友氏的多钟鼎尊彝，都是中国的鸿宝重器，不能让他永远沦于异域”。另外，皇室图书寮所藏的宋版唐钞、金泽文库收藏的儒释典籍、正仓院的千年古物等等，也可以用作赔偿。这番话当然是带着情绪说的，连他本人也不得不紧接着承认这个意见“不一定是对的”。[18]在谈到赔偿问题时，西南联大早在战争初期便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这就是中日战事史料收集工作。此项工作是政府有关部门交给联大历史系姚从吾教授主持，现保存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的“朱家骅档案”中，有一本署名姚从吾的《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蒐辑计划书（草稿）》，该书开篇为“工作目的”，称：“欲及时蒐辑已发表关于中日战事诸史料，以免日久散佚；并欲由此基础，以期进一步蒐辑关于此次战事的正式公文与当事人的公私记录，集中保存，他日得以成立一‘中日战史文库’，或国立图书馆的一个战史部。主旨在（一）系统的保存。”

（二）可利用已蒐辑的战事史料，分别编纂，以期树立若干间架，他日能完成若干种长编式的著作。”书中还策划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拟收集中外报刊、专书、言论、图片、政府命令公告、未刊手稿等，分别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体例编辑《中日战事记事汇编》，与熊克《中兴小历》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体例，编辑一部《中日战事纪略长编》。同时计划编辑的，还有《中日战事分区记事长编》、《中日战事书目提要》、《昭忠录史料汇集》等。[19]这本草于1938年8月蒙自分校、1939年3月增订于昆明的计划执行情况如何，笔者尚未见到详细材料，但1944年5月姚从吾在致朱家骅信中说“西南联大历史系主办之抗战史料征辑会，自二十六年（1937年）成立以来，已将八年，工作继续，乞未中断”[20]，证明战争爆发之际，这项工作便同时开始了。1946年6月上旬，西南联大与北平图书馆合组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正式结束，收集之各种资料168箱，全部交由北平图书馆接收。[21]联大历史系从事的这项历时九年的工作，除了保存战争历史资料，为后人了解战争全貌提供资料外，也带有为战后赔偿提供佐证的动机。（二）政体问题

战后解除日本武装和战争赔偿，是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必然措施，但而真正的关键还在要使日本的政体不再成为产生军国主义的温床，彻底铲除日本再次对国际和平形成威胁的基础。因此，战后处置日本诸事，最为核心的无疑是对日本政体的改造。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政治学家罗隆基这一点尤为强调。他说：“这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在同盟国方面，是奠定世界民主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有和平，没有民主，将来世界就没有和平’，所以，无论是处置德国，还是处置日本，前提都应当是怎样使它建立起民主制度。”[22]《当代评论》也持同样主张，它提醒大家不要以为说“只要对日本表示宽大，则中日两民族便可以永久和平相处”，凡是了解近数十年日本现状的人，不能不承认“黠武主义和侵略主义在日本有极深固的势力”。对于这种“以侵略为民族理想及宗教信仰的国家”，如果不彻底消灭军阀主义与侵略主义，不在政治上建立宪政传统，不改变黠武主义的教育与宗教，则日本就有可能“再成为侵略的潜势力”，以至“不难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又再度成为危害和平的祸首。”[23]按照西方民主国家模式对日本政体进行改造是势在必行的，可惜当时中国本身的民主制度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这就使人们讨论这个问题时缺乏底气，改造的途径与方法自难展开。（三）天皇问题

铲除军国主义温床问题，既包括建立民主政府、制定和平宪法，同时还涉及到一个绕不开的国体问题，即天皇制度是否应当继续存在。前文提到开罗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日本天皇制问题上的意见交换，是一次私下谈话，当时并未公布。不过，美国的一些类似舆论很快传到中国，如史密斯氏在《美国政府战后处置日本的计划》一文中所说“至于皇室的命运，我们准备让日本国民去决定”，《生活》、《时代》、《幸运》三杂志联合草拟的《日本投降的条件》中也说“我们并不建议强迫日皇逊位，或改变日本的政治机构”等等，曾相继在中国媒体披露。而1945年1月的第九次太平洋学会上，各国代表在是否保留日本天皇制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也在中国民间引起爆炸。1945年9、10月间，美国合众社社长白里访问重庆，在一次宴会上蒋介石主动对他说起开罗会议与罗斯福的意见交换，合众社遂将蒋介石与白里的谈话全文发表，立即引起国内外的注意。10月18日，杜鲁门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赞同天皇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人民的自由选举，并称蒋介石的意见用意甚善。[24]但是，通观中国民间的主流舆论，则坚决主张废除天皇制度。第九次太平洋会议，昆明《正义报》特发表《战后日本地位》社评，表示了“坚决主张摧毁日本的天皇制”的态度。指出“天皇是战争的罪魁”，“天皇制更是日本青年向外侵略，顽强作战的精神原动力”，“天皇制不取消，日本的自大狂和忠君爱国的思想即无从取消，日本国内的民主势力也就不容易抬头”。[25]《正义报》的立场得到社会学家、联大教授费孝通的响应，他的《太平洋上的持久和平》就是作为声援而撰写的。费孝通的文章发表于第九次太平洋学会结束的第二天，他对太平洋学会上一些人放任日本天皇制继续存在的态度表示极大不满。针对英美国家有某种认为日本天皇和英国皇帝相同，既然英国皇帝没有阻碍英国民主的发展，日本天皇也不该成为日本民主的阻碍的舆论，费孝通指出“事实上天皇和英皇是不同的”，“天皇制度和民主政治是不相容的”。他分析说，两者的不同在于首先是“天皇制度中直接包有军权的部分”，虽然“在表面上日本是模仿英国的政体，有国会，有内阁，而且内阁得向国会负责”，但是，“实际上海陆两相却不向国会负责，而是直接向天皇负责的。在内阁更迭的时候，军部可以不受影响，反之，若是军部不满于向国会负责的内阁，他们可以退出，不推荐任何人选，使内阁垮台”。正因这种体制，“日本民主基本上变了质，成了一个骗人的招牌，作军部统治的烟幕。”费孝通断言“军部统治的基础就是天皇制度，天皇不废，日本人民也永远不会享受民主的政制。”其次，费孝通还分析了日皇与英皇的不同还在于“天皇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家长”，“天皇是被认为神权，他即是像桀纣一样的暴戾，人民也不能革他的命”。这种“宗教信仰上的绝对性”，使天皇也成为“军阀财阀的家长”，并且“造成了军阀财阀的绝对性”，这就使“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就永远说变不出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根据以上理由，费孝通认为不仅“天皇制度是阻碍日本民主的根本力量”，并且在“天皇制度下的日本很难有自动的蜕变”。为了太平洋的前途，也为了日本人民的自身利益，他主张必须利用这次日本战败的机会，“代替日本人民把这个‘神的代表’烧了送回上天，使他不再在人间作祟”。[26]废除天皇制度，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的人一致主张，不过刘文典又一次对这个问题做了修正。他认为日本政体改造

的关键，在于推翻皇位改建共和国体，而不在是否保留“天皇”这个名号。有着考据癖的刘文典，说“天皇”这个称号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唐代武则天临朝时，臣下尊称她为“天后”，把她的丈夫唐高宗称作“天皇”，日本的典章制度多抄袭中国唐朝，于是也跟着叫自己的君主为“天皇”。后来，天皇这个名号被人利用，硬说天皇是天上神明降世，要统制世界万国。刘文典主张“天皇”可以保留，但名号需要改变一下，削去“天皇”两字，改称“日本国王”，以“防止将来再被人利用曲解”。其实，对于天皇问题，刘文典认为这属于日本自己的问题，“用不着我们去强做主张”，一定要去主张，“反而会伤害感情”，到头来可能“适得其反”。总之，“日本本身的事，让日本人自己去管，牵涉到别国利害的事，大家商酌着办”，唯有“大家一致维持拥护的办法”，“才能垂之永久”。[27]在几乎异口同声要求废除天皇的舆论下，刘文典的意见的确有些出入，但他的出发点和目的，则与大多数人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永久和平。

抗日战争结束后，西南联大知识精英对于处置日本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其中有些意见也很有代表性，如冯至就曾在一篇专文中反对在处置日本问题上吹嘘“大国民风度”[28]。不过，由于对日本的清算已决定在旧金山会议讨论，也由于国内矛盾凸显，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转移到反对内战问题，故本仅论述的范围仅限于在战时。

出现近七十年前的这场战后处置日本问题讨论，本已成为历史的一页。而且当时人们各抒己见，有异有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今天，旧事重提，并非对这段历史的眷顾。当前，中日两国关系虽然被称之为破冰阶段，但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仍存在不少分歧。在这种形势下，回顾联大知识精英当年的见解，更能展示他们关心祖国前途、爱护世界和平的积极精神。这一点，无论何时都是最宝贵的。（2007年7月10日 东京）

[①] 《论日本战后国体》，重庆《大公报》社评，1944年1月31日。

[②] 《太平洋学会开幕将专注讨论战后处置日本方法》，云南《民国日报》1945年1月9日。

[③]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云南《民国日报》社论，1944年6月15日。

[④] 钱端升：《论外交根本政策》，《新民族》第2卷第13期，1938年10月9日。

[⑤] 王迅中：《战后远东和平的展望》，《当代评论》第3卷第4期，1942年12月7日。王迅中即王信中，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名字为后者。

[⑥] 王迅中：《战后远东和平的展望》，《当代评论》第3卷第4期，1942年12月7日。王迅中即王信中，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名字为后者。

[⑦]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这篇评论文末署名“启”的执笔者，当是联大教授伍启元。

[⑧]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0日。

[⑨]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⑩]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1]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2]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3]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上），《当代评论》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14] 伍启元：《中国对日要求赔偿问题》（下），《当代评论》第4卷第7期，1944年2月1日。

[15]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上），《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0日。

[16]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17]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18]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19] 姚从吾：《卢沟桥事变以来中日战事史料蒐辑计划书（草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0]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5月22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1]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6年6月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

[22] 努生：《民主化日本》，《民主周刊》第1卷第6期“短评”，1945年1月20日。

[23] 《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当代评论》社评，第4卷第6期，1944年1月21日。

[24] 《日皇存废问题》，昆明《中央日报》社论，1945年10月23日。

[25] 《战后日本的地位》，昆明《正义报》社论，1945年1月12日。

[26] 费孝通：《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昆明《扫荡报》“星期论文”，1945年1月21日。

[27] 刘文典：《日本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下），《云南日报》专论，1944年3月31日。

[28] 见冯至：《记忆与忘却》，《自由论坛》（周报），第32期，1945年9月29日，第1版。

文章录入：zhangzy 责任编辑：huangcs

- 上一篇文章： 近年来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管窥
- 下一篇文章： “一二一”运动期间西南联大教授会出席情况评析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